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乔力 主编

儒林外史

[清] 吴敬梓 著 荣斌 校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北京京联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儒林外史

〔清〕吴敬梓 著 荣 斌 校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儒林外史 / (清) 吴敬梓著; 荣斌校注.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 乔力主编)

I. 儒... II. ①吴... ②荣...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1427 号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儒林外史

[清] 吴敬梓 著

荣 斌 校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发行

(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园 17 楼 (010)87873533 邮编 100068)

新华书店经销

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5.375 印张 366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80680-184-7 / I·103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065007)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顾问	王运熙	邓绍基	吴宏一	陈华昌	杨雨前
	张炯	傅璇琮			
主编	乔力				
副主编	邵东	胡大雷	黄道京	葛承雍	

编纂委员会

丁少伦	马自力	马奕	门岗	方智范
王定璋	王英志	甘英	刘文忠	刘庆云
刘怀荣	刘扬忠	刘明浩	刘峰焘	许总
乔力	池倩	朱晓晨	杜贵晨	李方
李少群	吴兆路	吴章贵	张玉璞	张亚新
张光芒	陈庆元	陈如江	陈洪宜	杨明
杨政	欧明俊	武卫华	施议对	周满江
周锡山	赵永纪	赵敏俐	胡大雷	荣斌
洪本健	高巍	聂言之	崔海正	桑林佳
徐其超	曹顺庆	章亚昕	黄道京	黄霖
寇养厚	韩毓	郭丹	葛承雍	程郁缀
管士光				

总 序

乔 力

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会天然地形成一种非常优势,使得中国文学有可能在足够漫长的时间里创造出辉煌业绩,给人类文明留下极为丰厚的精神遗存,供我们民族永远怀想受用。不过,像许多事物都拥载着多元复杂属性一样,如果从对面角度来看的话,则又同时变作某种很沉重的承传负担。因为一旦面对这些山聚海积般浩繁汗漫的书册卷章,便立即涌生出接受的困难困惑:你到底应该读些什么?究竟怎样读?而实际上又能够读得了多少?——局限于主客观种种条件的制约,社会或个人都难以做到无论巨细差等,皆通体包纳,所以,就必然性地出现了如何选择乃至精选的问题,并进而牵涉到一系列的判断观念和运作标准。

新世纪伊始,直面自然人文等各学科门类的分工日趋专精细密、生活工作节奏紧张快捷、实用功利日强化而竞争异常激烈严峻的局面,现代中国早已疏离了古代农业社会那种伴青灯明月、细细把玩体味以穷年皓首的闲散心境与惟求任心适意、不需再计虑效果收益的淡泊无为态度。那么,已然产生凝固而属于历史的文学作品,怎样才能够跟随不断发展前进的时代步伐,仍成为文明生活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融入未来,并由民族走向世界,张扬它永恒的美?换言之,永远是人们感性的愉悦飞扬和理性上育导教化的绝不能被替代的必需。

缘于上述,我们方始编纂这套大型书库,指出了贯通古今、以时代纲领文体的结构框架和精选的、具载恒久垂范意义的“经典”式作品总汇——即通过纵向的历时性观览,从整体上展现自远古

洪荒的先民制作开端直至最较晚近的 1949 年以前的所有中国文学产生、发展、丰富、极盛而蜕变新生的流变轨迹与大略面貌。使人们在直觉审美感受的过程间,获取系统全面的中国文学知识,熟谙洞悉它的每个结构成分。另一方面,也借助横向共时性的断面取舍,使得相应的具体作品充分传现那些关于文学本体以及某一特定文体样式的美学特性和艺术精神;并因其创作巅峰的最绚丽景观所辉耀的最大可能性范型价值,或由一定的阶段空间所显示出的一定更代嬗变类型。要言之,它们既包容有当时的复杂社会现实的典型意蕴,同时又未曾丧失、消解掉充沛张扬的现代生命活力,乃是屡经时间长河的荡涤淘洗,以代积层累方式架构起巍峨的中国文学经典大厦。它千门万户、千姿百态,永远流闪着辉煌璀璨之光。

下面再就《中国文学经典书库》的诸有关事宜略为阐明:

——首先是读者定向。我们关注的是具备中等文化程度,乃至大学生、研究生、工作着的白领蓝领们与所有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最广泛的读书界朋友。衷心希望《中国文学经典书库》能成为你们的“精神家园”,为你们不断追求探索的焦灼心灵伸展开一片清新温馨的绿荫,吹进青春热情的气息。

——其次是编纂的框架构想和意图。这里自然是以文学作品为主体部分。具体而言,每种精选本前皆首先设置“导论”,概述本文体于此书所界定之历史时段内的演进行程和重要业绩,并在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上,论析其表现特征、思想内涵及主流艺术精神;进一步阐述因整个文学现状与此特定文学样式自身运动规律所生成出现的创作流派、风格面貌。而以后的篇幅,则以选录的作家作品为单元。“作家简介”除却例行的生平行迹说明外,特别注重其文学活动及与文体相关的创作情形,目的在于强化“评论”色彩,由之使这种个案的微观烛照同“导论”的具体文体现象的中肯评析,以及《中国文学经典书库》收入的《中国文学

史》中的“总论”《中国文学流变概说》所作的宏观把握,形成为点、线、面纵横交织、互相呼应的框架结构模式。至于选录作品,首先认定的是审美价值——一种纯文学本体的意义,然后就艺术创造性来统领其他社会教化等内涵,求得两者的有机融合。其后的“品鉴”,则无论总览俯览、远察旁涉为印证而生发妙境,还是探幽抉微、精骛细辨以臻达澄彻洞明之胜地,抑或径从个别主旨、意趣、背景来进行阐释考订,均系视各自实情的需要落笔,并不强求规范一致。相反,我们倒是力求多角度、广视点的繁色纷采,精当出新。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除却主体的作品部分,还另有五种既断代又互为联续衔接的《中国文学史》,虽然各自具载相对独立性,但整合总观之,则成为从先秦直及现代的通史。考虑到前面主体部分既有的“导论”、“品鉴”及此书中的《中国文学流变概说》,已经构成的交错呼应的网式框架所涉及过的内容,为了避免重复,同时也便于改变、拓展视野,故这部文学通史则侧重于对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上整体文学面貌的宏观把握,注重描述其行进过程中产生的艺术流派及创作风格、文学思潮、重大现象等,尽可能地弱化一般作家作品的具体剖析。当然,在总则方面遵循这种撰写精神的基础上,各断代文学史也有各自的特点,方式方法并不求整齐划一。

——另外,作为一部集体协力撰写完成的大型丛书,我们一直强调贯穿通体的连续谐调指向,故而与另一类的个体研究著作同样承载着严肃的责任感。应邀参加的多为学术造诣深厚精湛的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山东、广西、辽宁、山西、江苏、福建、湖南、四川、贵州等各地声誉卓著的高等学府和专业研究机构,其中有些熟识并在我主编的另一些丛书、书系里多次合作过,有的却是首次共事。但无论怎样,我们大家都抱有事业与友情并进的相同宗旨,愿意在有限的生命途程中做一些有意义的事,留下一段美好愉快的记忆,以慰藉那本原性的苍凉。

上个世纪初,值当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五四”的一批知识精英以大智慧、大学识、大勇气,奋然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僵化、因循守旧陋习,引进西方近现代文明,倡扬“民主”“科学”精神,吹进来健康新鲜空气,以永远的青春和激情开启一代新风,让人们看到希望和未来——每想到这些,我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如今又值新世纪伊始,考量已往,眺望前途,将会作出什么样的思考呢?我想,是该出现文学文化大师、学术巨人的时候了。但现今触目所见,太多了些掂斤称两的匠人雕琢的小家子气。就一定意义而言,大师巨人的产生需要最广泛普遍的、适宜的文化基础与时代土壤,但适宜的基础、土壤则需要长时期的积累培植。那么,就让我们脚踏实地,从提高整个民族的文明素养、文化学术素质起始,作一些消除浮躁之气、纯净人们心灵、积累培植基础的工作吧!记得上世纪40年代初,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名人传·贝多芬传》的“译者序”说:“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了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该有更深刻的意。”我想,这是“五四”精神的延续和一种新的演绎。由是言之,除却工艺技能与客观科学知识的训练、学习外,文化文学素养的充益提高,对于“心灵”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同着新世纪的朝阳前行,是应该也完全可以有所作为,这既是幸运,也更是历史的使命——《中国文学经典书库》便是最新一份工作成果,愿新世纪的人们喜欢它。

无庸烦言,限于学识和精力,诸多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教正,这是对我们的关心与鼓励,铭感之情将永远在我们心中。

2004年春于北京旅舍

导 论

一、关于《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安徽全椒人,出身于地主官僚世家。少年吴敬梓曾师从塾师读书,对经史诸书多有涉猎。青年时代他随父宦游,往来于江淮之间。吴敬梓 22 岁时,父亲被罢官,他也随父返回故乡,翌年,父亲去世。作为独子的吴敬梓刚刚开始独担门户,便遇上了来自家族内部的打击。族人欺他两代单传,放肆掠其祖遗财产,使吴敬梓备尝世态炎凉。青年时代的和谐生活和美好憧憬,几乎在一夜间便被打碎了。吴敬梓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他开始以放纵恣肆来发泄心中的不满,表示对虚伪狡诈和贪婪自私的鄙夷。由壮志卓犖到纵情悖礼,这是吴敬梓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重要转变。

吴敬梓的不羁和叛逆,并没有丝毫减轻封建宗法势力与他的冲突,不仅祖遗财产很快散失殆尽,他本人也被封建势力当作瘟疫一般严加防范和竭力排斥。33 岁时,他愤然离开故土,举家迁往南京。

迁居南京后,吴敬梓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社会地位也日渐下降。生活的困顿使他更加体会到了贫穷的痛苦,从而对劳动人民的疾苦也更加同情。社会地位的下降使他更加感受到了封建统治的黑暗,对腐朽的社会制度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乾隆初年(1736),安徽巡抚等人推荐吴敬梓参加博学鸿词考试,他却称病拒绝进京参加廷试。对此,吴敬梓在他后来所作的《美女篇》中深表庆幸,他

说自己亏了没有像被荐入宫的富家女那样去过见嫉受困的日子，而是像汉皋神女那样保持了自由之身。而且，从那以后，他索性放弃了诸生籍，连乡试、科岁考等都不参加了。

当然，吴敬梓的叛逆并不是颓废。清初一些进步思想家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对吴敬梓有很大影响，他的叛逆逐渐由自发变为自觉。这主要表现在他由行为的恣情任性，逐渐转变为政治态度与统治者离心离德上。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境界下，吴敬梓创作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朽地位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具体年代，尚难详考。最早记其事的，是吴敬梓的好友程晋芳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所作的一首《怀人诗》。诗中说：“寒花无冶姿，贫士无欢颜。嗟嗟吴敏轩，短褐不得完……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可见，此时吴敬梓已完成了这部巨著。

吴敬梓于乾隆十九年（1754）十月二十九日在扬州病逝，终年54岁。

二、关于《儒林外史》的创作特征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堪称第一流的长篇小说并不多，人们公认的只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几种。其中前三种的创作，都是在一定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经说书人衍为故事并历代相传后，由文人进一步加工而成的。实际上，这是一种集体创作。从《金瓶梅》开始，这种创作过程有所变化。该书虽有部分内容因袭前人，但基本上是文人独立创作的。而《红楼梦》和《儒林外史》则完全是文人的个人独创。除了创作过程相同之外，《红楼梦》和《儒林外史》还有一个共同点，即二部杰作都是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然而，同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二部作品又各有侧重。相比较而言，《儒林外史》所表现的生

活范围更为普通士民所熟悉,所表现的人物形象也更贴近普通士民。

以上,我们将《儒林外史》与其他著名长篇小说略作比较,并非为了品评这些名著的长短得失,只是为了提醒读者要充分注意《儒林外史》与其他名著的同异而已。那么,《儒林外史》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 对知识分子群体进行全方位展示和剖析

《儒林外史》与其之前的小说不同的一点是,它不是写历史演义,不是写英雄传奇,不是写神魔仙怪,而是写“儒林”——知识分子群,写八股科举中的知识分子百态——美的和丑的、善的和恶的、真的和伪的。它不仅展览儒林百态,而且剖析儒林百态。作者的笔锋不仅活画了群儒嘴脸,而且深入到他们的精神褶皱里,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他们的灵魂。

迂儒,是《儒林外史》刻画最成功的形象。这些人,既是封建科举制度的积极参与者,也是自觉自愿的受害者;他们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比如周进,这是一个用全部生命去搏取科名的人。他苦读了几十年书,60多岁了还没考上秀才,仍是一名老童生。一次次的科场失败,扭曲了他的灵魂,他自轻自贱,逆来顺受,在秀才、举人们面前他像奴才似地承受着各种屈辱。更可怕的是,一次次的碰壁并没有唤起他的觉悟,他甚至连丝毫的怀疑也没有,连丝毫的反抗也没有。当他偶然有机会到了不是秀才不能进的贡院时,不禁百感交集,长期郁积在心中的苦楚和绝望彻底击倒了他(一头撞到了号板上)。虽然周进最终还是有幸敲开了科举的大门,但他心灵的创伤却是不可弥合的。范进与科场偃蹇的周进相似,在屡屡失望之后,他侥幸中举了。当范进听到中举的消息时,他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接受这一事实的思想准备的,他那脆弱的神经终于在这一强烈的震动下失去了平衡——他疯了。书中对范进中举做了喜剧式的描绘,让读者在感到可笑的同时,

也对范进这一悲剧人物感到了可怜。马二先生也是迂儒的一个典型。他虽然几十年科场不利,但却虔诚地迷信八股。他不仅自己心甘情愿地接受八股制艺的愚弄,还以八股选政为业,死心蹋地充当八股传教士。他以八股“专家”自居自荣,而实际上他只是个八股呆子,他竟然相信世上有三百年的活神仙能炼煤成金,结果被“神仙”着实玩弄了一场。从马二先生的朽拙愚昧中,人们正可看出八股对知识分子的毒害。《儒林外史》塑造的众迂儒形象中,最令人可恨又让人可怜的是王玉辉。这个笃信封建礼教的老秀才,在女儿死了丈夫表示要绝食殉夫时,他不但阻止,反而予以鼓励,说出了这样一番混账话:“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父亲的反对,老妻的哭骂,他一概置之不理,眼睁睁地看着女儿绝食七日,活活饿死了。他用女儿的生命去换取礼教的花环,毁灭了女儿,也毁灭了自己。因为他作为一个人,只能在情感与观念的搏斗中虐待自己。

《儒林外史》中对迂儒的刻画,用笔最为犀利,因而这一批人给读者的印象也最深。

有闲文人,是《儒林外史》中出现最多的人物。书中集中写了三群,一群是湖州莺脰湖高士,一群是杭州西湖斗方诗人,一群是南京莫愁湖定梨园榜的名士。这一批有闲文人,多半为无聊名士,有的甚至是无耻之徒。

莺脰湖高士们的盟主是娄三公子(璩)和娄四公子(瓚)。此二人作为相门公子,钱财地位自然不求自有,荣归故里湖州后,为了满足对虚名的渴望和填补无所事事的空虚,便装模作样地求贤养客起来。二位公子的“豪举”与战国时代信陵君等的养客完全不同,他们只是以高雅包装猥琐而已。请看他们召集于门下的都是些什么人:杨执中,是二位公子二顾茅庐请来的一个“老阿呆”,他参加乡试十六七次也未中举,却自欺自诩,一心要当高人。然而就

是这样一位高人，连一个小盐店也经营不了，不但亏了七百多两银子，还蹲进了大狱；有幸得到娄府公子赏识后，他故作高雅，又是赏月又是观梅，但他那蠢儿子偏偏又让他大出洋相；他向娄公子大力推荐权勿用，吹得天花乱坠，而当权勿用犯事后，他却马上推卸责任；他最爱向人讲自己是如何淡泊功名弃官回乡的，可是他却长久地把报帖高悬客座……权勿用，是一个受杨执中昭示后自我感觉也成了“高人”的人，其实，他是个“不中用的货，又不会种田，又不会做生意，坐吃山崩，把那些田地都弄得精光，足足考了三十多年，一回县学的复试也不曾取。”虽然“高人”的花环是别人给他戴上的，他却也自认了，因为他太想当高人了。然而“高人”的花环并没有使他风光多少，他还是露出了俗人真相，成了人们的笑柄……张铁臂，是娄府二公子召至门下的惟一武士，他没有耐心烦像其他门客似的，一边陪着阔少消食，一边揩捞零星银子，他把自己装扮成杀仇遂志、明珠报德的豪士，略使手段便让娄家公子掏出了五百两银子给他。可笑的是，当他远走高飞后，娄家公子还痴痴地盼着他回来庆贺一番呢。如果说杨执中、权勿用等是自欺欺人的话，张铁臂则可谓欺人不汗颜的奸刁之徒了。

西湖斗方诗人大致可分两类：一类以景兰江为代表。他们没干过什么损人利己的勾当，也不去漫无边际地吹牛撒谎。他们只是自媚。这些人以诗名当功名，整日沉浸在幻想之中，享受着自我精神慰娱。他们于社会无益，于自己无益，只是社会生活中无聊的一群。另一类以匡超人为代表。他们比前者要“聪明”得多。既混迹于诗坛，又在八股世界经营；他们敢自吹自擂、攀高结贵，一心投靠权门，甚至只要有人给钱，就可以去代人作枪手；他们会随心所欲地搬弄天下各种道理来为自己服务，可以毫无顾忌地忘恩负义。而恰恰是这种人，又总能沾到一些便宜，如匡超人最后就被“题了优行，贡入太学”了。

在莫愁湖排梨园榜的名士们，也是极其无聊的一群，其中代表

人物是杜慎卿。他有钱有地位,所以他不以中举为自己的人生目的,也不必去在科举小道上与别人拥挤,当然更不会去撞号板。他的富足可以使他在无聊的坦途上徜徉,所以他的人生价值就在于一个字——玩。他清淡酣醉,吟风弄月,甚至连在太阳光下看到自己的影子,也会徘徊大半日。至于他与一班人所搞的梨园排行榜,实际上是无聊之徒为弥补精神生活的空虚而搞的“选美”,而这,却是他一生所做的惟一一件大事了。他一边骂女人臭,一边纳妾;一边标榜清高,一边花钱捐官。他集潇洒风流与空虚无聊于一身,是一个的道的玩主。季苇萧与杜慎卿稍有不同,除了同样无聊之外,他还多了几分油滑。他擅长随机应变,为的是能随心所欲。所以他不管词色地奉承人,只要有饭吃,吃谁的都行,跟谁吃都行。总之,只求风流、舒服。

《儒林外史》写的这一批有闲文人,实际上是一伙寄生虫。他们不博学,也不迂腐;他们无善举,也无恶行;这些人不会为社会创造什么,也不会为社会承担责任。他们有时候也忙忙碌碌,而一切忙都是因为闲的无聊,一切忙也都是为了玩。

贤儒、奇儒,是《儒林外史》中着重刻画的第三类人物形象。贤儒如虞博士、庄绍光、迟衡山等。他们不刻意追求富贵功名,注意道德的自我完善,在污浊的社会大环境中能够保持相对独立的人格。他们试图以古代儒家推行礼治的方法来“以礼乐化俗”,可是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取得理想的社会效果,人去时迁之后,留给人们的只是无可奈何的忧伤和感叹而已。书中写的奇儒以杜少卿为代表。他狂狷不羁,轻财好施,鄙弃八股功名;他不藉藉于富贵,也不戚戚于贫贱,只求恣情任性。这种思想境界显然与社会大环境不协调,但却是对社会环境的一种实实在在的反抗。

《儒林外史》中写的贤儒、奇儒,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知识分子的理想要求,有些人物的个性,有的与作者本人的情况极为相似,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作者的希望。在令人窒息的封建暗夜里,

这些人物能闪烁出叛逆的火花,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总之,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儒林外史》是第一个写知识分子群体的,也是写得最好的。书中形形色色的儒,构成了一幅知识分子百像图,人们从这幅图画中,看到了封建社会末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看到了封建体制的悲哀。

2. 自觉的批判意识与高超的批判艺术

《儒林外史》产生于封建社会末期。经过明清易代的社会巨变和清初的文化箝制,封建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已更加尖锐,封建社会的腐朽性也暴露得更加充分。在清初思想界中,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继承和发展了晚明思想解放的一些积极成果,对封建社会的前途开始了深沉的反思,一种对社会的批判思潮逐渐兴起。吴敬梓的身世和个性,使他很容易地接受了进步思想。他和一些清醒的知识分子一样,对封建社会的腐朽有着更深刻的感受。他企盼封建社会能健康发展,可是历史的发展规律总是无情地粉碎他的企盼。他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社会没落,总想力挽颓势,重整残局,于是,他拿起了批判的武器。

如果说,先于《儒林外史》问世的《金瓶梅》,在展示社会实态方面与《儒林外史》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话,细心的读者也不难看出二者在展示社会实态方面存在的差异。《金瓶梅》对现实社会以暴露为主,它把生活中的丑恶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面前,至于是也非也,要凭读者自己去评判。《儒林外史》则不同,它也暴露丑,却在暴露的同时明确地表示了作家的态度,作家在小说中对所暴露的对象进行了本质性的批判,以期在批判中让世人警醒。《儒林外史》中写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其中大部分是作者批判的对象。虽然作者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了不同的批判方式和批判力度,有的甚至寄托了作者深深的可怜和同情,但作者的总体倾向是对他们加以否定的,通过对这一群人的否定,进而否定八股,否定科举体制,否定使民族文化变异的社会形态。书中也描写了一些具

有叛逆性的人物,作者以赞赏的笔触去写他们,也正是为了通过写他们的叛逆,达到对时弊批判的目的。吴敬梓的批判意识是自觉的,这是由于他对封建社会已经看透了,已经意识到不批判不能重整残局,不批判不能匡正世风了。所以,他才对群儒那么不留面子。

当然,《儒林外史》的批判仍然是儒学范围之内的批判。吴敬梓敢于否定,敢于批判,但是他却提不出新的政治理想,因为他毕竟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当然,我们也不应对这位伟大作家提出超越时代的苛求。在那个时代,能自觉拿起批判武器,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儒林外史》的批判不仅是有力的,也是艺术的。社会上任何无价值的东西——包括腐朽的、落后的、垂死的东西,都具有某些不谐和的特点。普通人也许在日常生活中不会去留心那些不谐和,但在文学家眼中,那些不谐和则是宝贵的创作原料。

《儒林外史》的作者便特别善于发现那些生活中的不谐和,并且对它们予以加工提炼,然后像不经意似地展示给人们,让人们在蓦然之间有所发现,有所醒悟。为了达到更好的批判效果,《儒林外史》有时甚至用戏剧化的手法展示生活中的不谐和,如“范进中举”便是其中最精彩的一幕。

范进是一个老童生,当他终于祥瑞附身中了举人时,天大的喜事竟几乎成了飞来横祸:突然冒出来的巨大的惊喜与几十年的屈辱相碰撞,所产生出来的突发力量使范进在刹那间被扭曲了。作者不惜笔力地刻画了范进的变异——形态的变异与心态的变异,让他演出了一场洋相百出的滑稽剧。围绕范进的变异,作者还写了他身边其他人物(如胡屠户、张乡绅等)的变异。“癞蛤蟆”突然变成了“天上的文曲星”,这一件事情不仅改变了范进的一切,也改变了范进周围的人们,他们与范进同演了那场滑稽剧。人们在这一滑稽剧中不仅看到了范进那饱受创伤的灵魂的脆弱,也看到了

科举制度的可怕。

《儒林外史》的批判,更多的是在平缓的叙事中进行的。作者在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中顺手拈来,随时切入,不露锋芒地向人们昭示是非,写人物形象的一言一行本身,就包含着对某种思想倾向的批判。比如,书中写马二先生游西湖就是如此。

马二先生是八股的虔诚拜物教徒,他的一生都交给了八股选政。对八股的执着使他顽固地排斥任何美文学,因此他的爱美天性和审美功能也被戕伐了。这位在杭州选书多年居然不知西湖有何景致可看的书呆子,游了一天西湖果然遇美景而不见,更不用说西湖美景会给他增添什么文思了,只是他的食欲和色欲稍微得到了一点满足。书中写他游西湖虽然没出明显的洋相,但处处可以看出他的迂腐。当读者看到马二先生稀里糊涂地逛了一天,回到下处倒头便睡过去的时候,不禁会打心里问:有学问的人应该是这样游西湖的吗?虽然人们也许不会去笑话他,去指责他,去厌恶他,可是人们从他的言行中却可以感悟到更深层的东西,那就是使迂儒人性扭曲的根本原因——八股科举制度。

对《儒林外史》的批判,读者是在它所刻画的一系列人物形象身上感受到的。作者在运用批判手法时,特别注意因人而宜,注意掌握分寸,把握火候。书中只对极少数人作了最透彻的揭露(如对严贡生的狡诈和无赖),对多数人还是笔下留情的,如写周进、范进、以及众多无聊名士等。这是因为,作者的批判不是为了贪图一时痛快,也不是为了媚俗取宠,他是出于公心的,也就是出于一种对社会负责的责任感。封建社会末期的知识分子群体,是一个可悲的群体,作者要向人们揭示这种可悲,同时通过自己的揭示改变这种可悲。所以他写知识分子心灵的扭曲,并不是为了丑化其人,而是为了揭示其因。当然,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作者的批判也绝不是隔靴搔痒的,作者通过人物形象的典型化,使批判更富有艺术感染力,从而加强了批判的力度。自觉的批判意识与高超的批判艺